2007年1月10日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第二場:知識狀況與學術生產

王增勇:

剛剛元豪說法律是一個社會控制的工具,接下來我要介紹另外一個社會控制的工具,就是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在台灣的知識發展。當我在講知識的時候,是指比較廣義的知識,包括生活中的知識,因為社會工作作為一個強調有其知識體系的助人專業,它的知識是指由有學者生產出來的概念化的知識和附在表面之上的一些知識。但是社會工作專業的實踐主體,實務工作者,他在日常工作中面對被社會體制認定是「社會問題」、或是處於「社會邊緣」的這群人,社工員有他們自己的工作知識。只是這些知識它常常帶在身上,沒有轉化成爲文字被看見,即使文字化也沒有浮現到檯面上被認定爲知識傳遞的學術期刊。但是學術與實務的知識在工作領域裡面,就像是兩條不同軌跡的河流,有的時候撞擊、有的時候分流、有的時候混在一起,我要講的就是這兩股知識在台灣的歷史演變中,它的知識生產的狀況。

戒嚴時期:社會工作爲政治控制的直接工具造成學術與本土經驗的斷裂

第一個階段的社會工作知識生產要放在台灣國民黨戒嚴時期,社會工作作爲 政治控制工具的脈絡下來理解。在解嚴之前,因爲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認爲會丟 到大陸是因爲沒有控制好工運跟學運,所以所謂的「社會工作」在國民黨被定義 爲人民團體的組訓,也就是控制社會團體、學生運動跟工人運動。所以社會工作 被窄化成組織訓練的工作,後來在開放部分選舉後,成爲國民黨選舉動員的主要 機制,由國民黨社會工作委員會負責運作。這樣的社會工作與現在一般認知的社 會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它既不是在從事弱勢族群的救濟或福利工作,也不是在想 要幫助弱勢者發聲、讓弱勢者的權益得到保障,它的目的是要讓台灣民眾服從國 民黨的執政工具。這樣的社會福利體制比較常見於拉丁美洲軍事政權的福利體 制,從西方所學的受到六零年代人權運動影響的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概念是需要 經過政治篩選的過程,對既有政權具有顛覆性的概念是要被拔除或轉變的,那個 時候的學者多是經過國民黨制度認可的黨工或培養積極培養的菁英,因爲台灣並 沒有實施積極的社會福利制度,知識生產不需要回饋到實踐層面上。那個時候的 學者只要翻譯國外的文章就可以升等,生存在學院裡面。基本上那個時候的知識 是只爲了鞏固政權。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西方社工知識傳遞到台灣來經過政治 制度篩選的過程。在60年代西方國家如火如荼地推動社區工作,並透過聯合國 推廣到第三世界。因此,聯合國丟了一筆錢到台灣來推動社區發展,台北是的民 生社區、以及當時的平價住宅(如台北市的安康平宅、福民平宅)都是那時候的 計畫所建立的。在西方,社區發展是最有政治性的工作領域,強調公民參與的民 主精神。但到了台灣以後,社區工作被具體轉化爲最安全的社區服務工作,例如 環境清潔打嫂、媽媽教室,讓媽媽學做菜、縫紉等,這個就變成台灣版在60年

代推動的社區工作與發展模式。爲了推動社區發展的理念,內政部在那個時候成立了「社區發展季刊」,至今是台灣最久、流傳最廣的社工期刊。如果翻閱早期的那些社區發展計畫季刊裡面的文章絕大部分都是翻譯的文章,基本上跟台灣的社會現況是脫鉤、不產生任何互動的。編輯委員是由社會行政體系的政府官員和學院裡面的各個社工系主任學者所組成。因爲主辦單位是內政部而非學術團體,編審委員會的組成反應行政體系與學術體系的職位,而非學術聲望,因此在後來國科會評鑑學術期刊時,該期刊的學術性不被認可。也因爲國家的介入,近來社區發展季刊成爲例行性成爲國家政策的宣導刊物。這份期刊的半官半民性質見證了台灣社會工作被國家挾持的歷史記憶,也正因爲它被國家所控制才得以成爲台灣社工專業主要的知識生產與傳播的管道,但也因此它的學術性因缺乏獨立性而被否認。

國家與學術的共謀不僅出現在國內的知識生產體系上,也出現在台灣參與國際社會工作知識對話平台的管道上。知識界的學者與政黨的官員對內壟斷社工知識的生產,對外以成立社工或社福學術團體的方式壟斷對外發言權,他們代表台灣的社工學術組織參與國際研討會,每一年盛大的休閒活動就是由內政部補助出國去參加研討會。實際從事基層福利工作的社工員或民間團體完全都沒有機會與國際社工組織接觸,因爲這些對外發言跟申請經費完全都被這些學者跟官方他們共同形成的體制所壟斷。

國家對社福的輕視也反映在正式教育體制上。解嚴前,公立大學系所甚至沒有獨立的社會工作系,而一直附屬在社會系裡面稱爲「應用社會學組」,而社會工作只有在私立教會學校中才有,,所以它從來就不被國家認爲是一個重要的生產知識。

解嚴後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本土實踐帶動知識生產

一直等到解嚴了之後,這個「國家輕視社福、學術脫離實務」的知識體系開始有了變動,而轉變的契機不來自學術界,而是實務界。1987年解嚴後,台灣社會正經歷快速的權力結構解組與重構,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民間組織裡的社會工作者開始思考:「社會福利可以有怎樣的改變?」1990年起,民間組織社工員非正式成立了「社聯工作室」,以定期的讀書會跟時事討論,作爲集體行動的基礎,以記者會、公聽會的方式對國家提出挑戰與質疑。與當時仍爲在野黨的民進黨形成互惠合作的關係,對執政的國民黨形成施政上的壓力。例如1990與1992年的修憲,社會福利團體提出「社會權入憲」的訴求,並舉辦街頭行動劇,推動社會權的宣導。又例如,解嚴後,選舉成爲台灣政治力量重組的重要機制下,社聯工作室率先提出社會福利共同政見,爭取候選人參與連署,以交換社聯工作室成員的站台助選。那時在野的民進黨大量與社會運動合作以吸收各種社會力量的論述擴張選民的基礎,社聯工作室接洽民進黨文宣部,協助民進黨完成批判國民黨福利政策的宣導片,叫做「有福共享」,讓民進黨在選舉場合上以宣傳車公開播映。在那時廣電媒體仍被國民黨控制時,民眾高度歡迎這類在選舉場合所播放

的宣傳片作爲獲得所謂「真相」的管道。當我們拍完了以後再去找國民黨,跟他們說民進黨叫我們拍了一部這樣的片,你願不願意再給我們 30 萬?我們願意再幫你們拍一部片子來反制。不過國民黨沒有理我們。我要說的是,在那個過程裏面,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大量生產有關台灣社會福利相關論述,讓民眾可以理解台灣社會福利的問題與未來的方向。這種知識生產是貼近本土經驗,尋求被實踐的可能,與先前社工知識以翻譯或是被政治篩選過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在選舉的過程我們也開始慢慢提出社會福利的政見要求,這些候選人會以他們對選民的理解自行吸納與轉化我們的訴求,而民間社福團體藉由站台直接與民眾接觸,感受民眾對社會福利的想像,作爲後續知識生產的依據。所以在那個時候社會福利工作者利用這些站台的機會走到民間,跟民眾之間的對話。

一直等到 1993 年,解嚴後六年,民進黨爲了向民眾證明他們有執政能力,開始放棄國家認同的政見,而改用「老人年金」作爲當界參選縣市長民進黨候選人的共同政策時,社會福利議題第一次成爲選舉的主軸。因爲社會福利成爲政黨之間的辯論,社會福利團體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機會,發表對國民黨與民進黨政見的評論。那個時候,有一批媒體工作者很有社會關懷,因此提供相當篇幅報導與分析社會福利議題,所以那個時候媒體、還有民間興起的這種公民社會其實有一股很強的一種貼近在地經驗的知識生產過程,弔詭的是,習慣於依附國家的學者反而不敢投入。我們在拍「有福共享」紀錄片的時候曾邀請很多的學者,但沒有一個學者願意接受訪問談談他們所看到的老人問題、兒童問題、住宅問題。所以那時我們只好自導自演,自己上去講。但後來當這股民間的力量開始被政府所吸納、開始取得某種體制內的力量的時候,這些學者又是一窩蜂的想要擠進這些民間團體裡面,承接所謂「進步學者」的形象。我想這也是反應了台灣社會工作專業長期服務於政府所限定的工具性格。另一方面,它的是一種屬於「實踐」性格的知識生產方式正在開展,這種知識生產,不是從學界開始的。

被工具理性規訓的社工知識生產

我想稍微說明一下我們這些社會福利學者如何生存。在產官學互利的福利政策體制裡面我們有自己的一個生存的方式。第一個,政府會有非常多的委託研究,而從裡面能拿到的這種主持費其實遠高於國科會,然後使用的經費也非常的多。所以這時社工學者交際應酬能力是很重要的,你需要跟官方有很好的關係。我剛回來的時候因爲不太會喝酒,所以就被一個黨政關係良好的資深社工學者嘲笑:「你這樣子怎麼樣當學者呢?你連喝酒都不會!那這個關係怎麼能夠經營的好?」(全場大笑)我想那個也正反映了在那種體制之下你必須要具備某種能力。所以一個途徑是你專門承接政府委託研究,再轉包給學生完成。那你必須配合國家希望你反應的結論,透過學者的語言與權威爲政府背書,所以我們在社會福利界有所謂的「現代包公」,那個「包」是「包研究案」的這個包。他什麼研究案都包,然後再發包給研究生去完成。我曾聽說有一個學者他同時可以包八個研究案,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去找他指導論文,你要幫他做完研究案,那你也就可以畢

業。所以社會福利界形成了這樣的一種知識分包的生產上下游體系。這是一個社會福利學者在現在的這種體制之下,所可能有的生涯路徑。。

再來就是在 90 年代,台灣開始進入到一種社會福利大量委託民間團體辦理的方式。我認為這是政府在削弱民間團體與政府對抗的能量,把這些解嚴後的民間力量轉化直接成為服務的方向。例如,智障家長集結起來要求政府為他們子女的照顧問題提出對策,政府就提出經費補助委託給這些家長團體辦理,因為政府往往補助不足,所以從此家長團體就忙於籌經費辦理服務,但因為恐懼政府不再補助,家長團體也不敢對政府採取強硬立場。在民營化的過程中,政府建立很多管理機制,學者扮演很多角色,從一開始招標的評審,委託後的督導,委託完畢的評鑑,都需要學者扮演所謂客觀第三者的角色。

除了民營化政策將學術與實務分別放置在評審者與被評者的關係中,另一個 造成同樣權力關係的發展是社工證照制度的建立。過去實務界和學術界基本上他 們是兩個分流,然後實務界它比較不受到學術界的一個干預。透過民營化與專業 證照化,在90年代以後,透過國家的影響力,學術界的權力開始慢慢的進入到 實務界,尤其是在1998年通過了社工法。我都說社工證照是個學術與實務之間 的「不美滿的結婚」,因爲透過國家考試的形式,學者變成是要來鑑定社工界的 專業能力。所以在第一次考試,這些在台灣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資深實務社工人 十很少人可以通過考試,錄取率之低,引起了實務界大動作的反彈。醫院計工室 開始拒收學生的實習,因爲他們既然被學者認爲不專業,那他們就沒有資格指導 學生。但反抗的可能性越來越窄,因爲證照制度太容易跟國家的管理機制扣連 上,例如醫院評鑑中對專業性的操作型定義就直接以有社工師證照的比例爲指 標,或是委託民營辦法中以計工師資格作爲機構專業能力的評鑑指標。所以雖然 整個實務界初期的大動作反抗,但最後仍然進入到這個體制裡面去。證照制度對 社工專業知識生產的衝擊,我稱之爲「社工實務界弱智化」的過程。也就是說你 進入到實務界,他們已經不再有興趣跟你討論個案的問題,他們會問你的是「這 個問題計工師是否會考試?」

多年前楊姓受刑人申請假釋念台大社工的事件,在社工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我到了嘉義與社工員進行例行性的督導,其間有一位社工人員特地問我對於楊姓受刑人是否該假釋的看法。當下,我非常高興實務界對於這個議題有興趣,但沒有想到我後來問他們爲什麼會問這個?他們說「因爲社工師考試的考前猜題,認爲這題會出,而且預測是你會出題」。我那個時候當下心裡就涼掉了一半,看到那種對於知識的興趣已經不在於「我們如何比較好的服務我們的個案」,而在於「那是考試所需要的東西」。失去生產知識的主體性,願意將自己求知的過程交給外來權力,無疑是對台灣社工專業最大的戕害。

證照制度對學術界造成的另一個影響是用學位幫學校賺錢。因爲社工成爲證 照的時候,它成爲技職體系裡面招生報到率最高的一個科系,但社工又是投資最 低的一個科系,因爲它基本上不太需要什麼器材跟設備,它只需要一隻麥克風。 於是部分社工學者就在學校裡面開始大量開設學分班,幫學校賺錢。所以社工在 證照化了以後不光只是造成實務界的弱智,也造成了學者開始用這個制度爲學校賺錢。爲了擴張知識消費的市場,社工師考試的資格又降低要求——沒有社工相關科系學位的人,只要修滿二十個學分班就可以來考社工師。社工知識被考試制度給規格化,社工學者只要被列爲命題委員,他寫的書就會大賣,即使他的知識可能完全不適用於本土經驗。

社工知識生產的動力:站在掌權者與無權者之間的矛盾

最後我想講的是,雖然看到了這麼多悲觀的、荒謬的狀況,但是我還是覺得 在台灣學術界計工知識的生產,它的出路跟希望還是在於台灣這樣的社會福利已 經不再像以前流於清談,它經過90年代開始大量的社會福利的制度進入到台灣 人民的生活實踐裡面去。我覺得計工作爲一個貼近台灣第一線的專業工作人員, 夾在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矛盾是社工知識生產的核心。像台北市 14、15 號公園的 拆遷,那些老榮民的安置處理上,計工當初是第一批進入去做調查;當初說要廢 娼的時候也是社工人員第一個進去調查公娼轉業的情形。甚至於現在醫院有醫療 糾紛的時候,也是社工員第一個被派出去。地方政府有民眾抗爭的時候,他們就 派出社工員到第一線,希望運用她們的女性特質來轉化這個抗爭的衝突性。那些 經驗累積在社工人員身上,我覺得是整個社工知識生產裡面最重要的一個來源。 但是問題是這些社工人員,很多人進入到學院了之後,學院的學者不知道如何承 接這些經驗。但是社工人員進入到學院了之後開始到處找出路,那比方說像輔大 心理所的夏林清就是實務工作者大量會去尋找的對象。很多的學生他們會發現在 西方過去他所接受的實證工具理性,回到台灣之後他面對這些實務工作者他不知 道如何回應,在追求生命經驗透過知識生產過程被整理與耙梳的渴望,不斷帶領 著許多實務工作者大量從實證典範轉向詮釋典範,甚至於是批判典範。這趨勢雖 然仍不多,但是我也發現這些少數被生產出來的論文,被社工人員大量私底下的 影印跟傳閱。我不認爲說敘事或是說故事這種另類的知識生產,馬上會變成計工 之是生產的最重要形式,基層社工員一旦發現貼近他們經驗的知識生產方式,不 見得要跑統計才能寫論文。那個知識形式解放的過程,我覺得現在正在台灣發 生,所以現在有大量的社工員開始透過自己的機構,自己辦理自己的研討會,不 再是依賴學者來生產所謂的「論文」。我看到新的知識生產形式的開展,不在於 期刊、也不在於學術正式的論文裡面,而是在於他們需要找出路、他們需要找伙 伴、他們需要了解自己在面對這個台灣邊緣的民眾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覺得 這是最大的動力,但是其實我還不太確定台灣的社工界有沒有辦法去把這個經驗 轉化、承接成有效的知識,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台灣社工界在面對知識生產上最重 要的挑戰,但是我相信也是最具有批判性的時代。而我也一直覺得夾在民眾和國 家之間的計工員,他的知識生產一直環繞著這個計工存在的本質矛盾裡面,能不 能看清、認清這個矛盾,然後去選邊站,我覺得那是社工這個專業永遠必須面對 的分裂,但是也會是它最精采的知識生產的來源。謝謝。